



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论

张鸿雁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论

导论 (1)

上编 比较研究认识观

第一章 古代东西方城市初期发展特点论 (10)

一、不同历史前提奠定了不同城市内涵
形成的基础 (11)

二、西方：私人工商业与城市文明同步
中国：私人工商业与城市发展“错位” (17)

三、起点与生产工具发展水平的差异 (22)

第二章 古代东西方城市发展差异论 (27)

一、发展途径之不同 (28)
二、演化进程之不同 (33)
三、形成原因之不同 (38)

第三章 东西方古代城市文化的差异及属性论 (44)

一、城市人口构成的差别是城市文化质的差异
的决定因素 (45)
二、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特质 (54)
三、城市文化的本质差异及其原因 (62)

第四章 从东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关系透视城市本质及
功能 (72)

一、古典城邦的本质属性决定其不是一切奴隶制
国家的必经阶段 (73)

二、经济基础关系不同构成及决定因素	(85)
三、商品经济与城市政治结构的存在形式	(93)

中编 文化研究认识观

第五章 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关系论	(104)
第六章 城市产生的过程与原生文化环境	(118)
第七章 城市文化与社会文化选择机制	(128)
第八章 文化选择方式与城市文化功能	(145)
第九章 城市概念的文化思考与文化进化观	(151)

下编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观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城市史观论	(164)
一、城乡差别的产生	(165)
二、中世纪城乡对立及其历史地位	(172)
三、资本主义初期城市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176)
四、城乡对立消亡的必然性	(181)
五、东西方古代城市经济发展观	(186)
六、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问题	(192)
第十一章 从苏州城市发展史看长江三角洲区域	
城市化	(200)
一、苏州历史变迁的借鉴	(200)
二、苏州城未来发展的理论探讨	(204)
三、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化问题	(211)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及方式选择	(216)

导 论

人类历史长河奔泻，洒下无数繁星，点缀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创造。它的产生第一次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变个体与自然的生活、生产联系为社会形态的社会群体与自然的生活、生产的联系。城市作为人类改造大自然的一种结果形式，以其全新的方式组织着人的群体关系，在改造自然物和重新组合人工自然物的过程中，使一定地域空间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中心。城市通过居住设施、交通道路的组合，重新塑造了自然物和自然因素的组合形式，使“第二自然物”成为具有新的生态结构的人造环境，这个环境以其区别于乡村的集约效应，形成了“经济中心场”和“文化场”的“场效应”。各种信息、能源和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人，构成一个高度协调的人格化的有效空间。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城市在创造自己的文化，而这种“城市文化”又塑造新的“城市人”，在城市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

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的本质和体现形式。毫无疑问，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现象。正因为在城市内可以形成与乡村不同的文化关系和现象，城市在自身发展中才有可能有自己的经济运行规律。可以解释为，城市文化与经济不是因果关系，但在人类发展和文化进化的历程上，可以认为“城市文化场效应”的特殊功能。

当人类从乡村走进用城墙围绕的居住区并利用货币关系维系生活时，这一居住区里新产生了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各种先进的文化艺术、思想、科学技术无不首先在城市里产生。也就是说，漫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场效应”，城市何以能超过乡村十倍百倍地创造财富？

比较乡村而言，人类居住在城市里，在表面上看，离自然更远了，但就其依赖关系而言，城市对自然以其整体形式，表现了更强烈的依赖需求，可谓城市比乡村离自然更近了。人类的一部分生活在城市里，以社会群体的关系依求自然，一个城市如果有一天缺水、缺粮食、缺能源，都会使城市生活秩序发生混乱。而其认识角度是，城市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短缺现象，城市社会以更深层的关系贴近自然，以群体的和城市社会整体的力量与自然界斗争。不言而喻，城市亦是人类同自然界斗争的必然的结果。

当我们以宏观的眼光看待地球时，它是天体的一部分，在太阳系的运行中，在阳光的世界里，地球上的城市演示着人类文明进程。地平线上，那光耀夺目的是俯瞰乡村的城市；那耸向天空的建筑，以其特有的语言展示着人类的智慧；那人工自然的组合；以其独具的韵律述说着现代文明的飞跃！

人们不禁要问：城市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它是人类的归宿吗？将来会怎样？为什么城市经济、文化比乡村发展快得多？

在灰暗高大的古代城墙面前，人们更多感受的是冷酷和威严；在现代城市的怀抱里，人们感受到是差别和繁杂。

是的，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掩映着平民的住屋；现代超高层建筑的华丽和富贵，正在驱赶着破旧的老城区；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拥抱着市场的喧闹，也容纳着当代科技和“现代人”，创造着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

不能掩饰这样的冲击：城镇以外的乡村文化和生产方式落后，几千年来总是陪衬着城市文明的发展。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乡村中自然经济受到某种破坏的产物。那么，推而论之，乡村文化是自然经济文化，而城市文化则可以认为是商品经济文化。所以，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群体，为什么偏偏产生在城市里，人和人的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为什么表现形式大为异趣之谜，便可以找到答案了。

乡村的自然经济，以个体的自我生存、生产为主线。城市的商品经济文化以群体竞争为主线，在竞争中社会产生动力和创造力。乡村以自然分工为主线，城市文化以社会分工依存关系为主要形式。每一个人以单一的工作、技能为谋生手段，在尽可能狭窄的技能和需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里，技术可以成为一种所有形式，并且，社会本身需求并选择那些有技术和有创造力的人，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真正享受者。

探索，人类从穴居走向游牧，又从游牧走向农业定居，再使一部分权力者——富者走进用城墙围绕的居住区。现代世界发展的历程是乡村城市化，在一些国度，已不存在以往乡村的涵义。在这样的演进中，人类一直在试图了解自己创造的城市，探索在城市里如何更能使人类自身有更大的发展。

显然，城市不是自然的造物，是人类劳动和劳动关系的造物。人的劳动和劳动关系随着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形成更繁杂和更深刻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以深化不已的社会分工变化形式体现出来。分工深化不止，吸引农业人口的力量越来越大，只要城市和乡村共存一个区域和国家，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就不会停止。这一现象已经以动态的形式，发

展了数千年，从而证明了一个规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城市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集中写照。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历史集中表现为城市的历史。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仅是建筑、交通、生产等系统在空间上的构成形式，更主要是人的关系和文化构成。作为城市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人的文化和文化产物；这些文化信息和能量以特殊的物质表现形式，与自然进行某种交接，使人、文化系统、社会构成、生存物质、交往关系成为有机联系的一个环境，这种环境成为人类飞跃发展的基地。事实上，人类走进自己创造的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是为了发展地生存。然而，在本质上说，人们在为了获得更好生存中，即寻求某种人类需要的生活方式中必然地构成城市生活方式。是人类的生存、发展使人类必需劳动，劳动的发展使人类必然结成某种关系，在追求中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在生产力发展中，城市成为最好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场地和集中表现。简言之，城市是人类追求生存方式的一种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沃思在1938年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城市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这部有影响的书中，沃思把城市归范为“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的永久性居民点”。概括为众多、密集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沃思对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进行了如下论述：1、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表现为社会流动性增加，世系门第观念的淡薄，个人努力的作用增大和阶级结构的复杂化；2、空间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对住宅无乡村农民那样的眷恋之情；3、密集的居住反而使大家很少认识，复杂的社会分工又使大家处处依赖。沃思的结论未免有些浅显而又表层化，但他的理论至少论证了城市生活方式的依赖本质。正如马克思

指出的那样：在城市里“个人”生态的必要前提是“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① 的差别的出现，在这种差别中，人的关系展现一种规律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依赖关系。

城市文化和城市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奠基于劳动分工及协作，这里的生产不完全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由于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加速器，所以，城市自然成为某一地区各方面的中心。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城市加上道路网络，使某一地区成为有机整体。城市密集地区，也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城市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岁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城市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古今城市可以说有着质的飞跃，在诸多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差异。但是，无论对古今城市的差别如何认定，或者寻找多少差别表现，从作为乡村的对立形式以及起到的积极意义的作用看，古今城市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化进程又受着乡村发展的影响。前苏联学者H·B·龙赫涅娃认为由传统市民社会体现的传统，正在同来自乡间的移民所带来的那些农村习俗发生冲突。“城乡生活条件的差别越显著和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市民越多，形成特殊的城市文化和克服农村影响就越快。因此，城市化水平越高，市民的文化就越带‘城市’性，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越高，乡村影响就越强。”^① 这一结论虽然是从城市文化的功能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6页。

上阐述的，作者不自觉地论证了城市经济的时代特征集中表现为城市文化特征，而与乡村比较，城市功能是与城市发展水平成正比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城市的研究只是在表面布局和沿革方面有较多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城乡差别和这个差别产生的原因。近百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成为全球性问题，城市迅速膨胀，使所有国家都面临新的城市问题。为了民族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研究成为世界性热点课题研究之一。特别是二战以后，城市研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城市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有所发展还是在1980年以后，直至1983年，有关城市研究的文章还屈指可数。近年来城市研究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重点，如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城市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等等，无不把城市研究放在突出位置，有关文章、论著成倍增加，可以说，城市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丰厚的大国里，城市研究亦如多学科一样，没有完整的体系，没有鲜明而系统的学派风格，更多的是介绍国外的城市研究，说明和解释国外的城市研究，故而城市研究一直处于一个低理论轨道运行状态。打开许多城市研究论著，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何以如此？集而言之，主要是既没有把城市研究看成是理论研究之后的再研究，也没有弄清楚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局限而创造自己的城市理论体系。这样，有些城市研究首先是在概念、范畴上游离不定，或把城堡视为城市，或不知道自己研究城市的角度和对象属性。因为城市是一个特殊综合体，许许多多的学科都可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如城市哲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等等，历史学、地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人类学、市场学等都可以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这样，一些城市研究在概念和范畴上不规范，最后导致学科内涵、属性的不确定。研究方向角度不独立，学科和学派的建立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由于城市理论研究薄弱，很多城市研究空泛而又直观化。或是用人们熟知的解释城市经典语言笼统论城市特点，或是单纯介绍城市沿革，这样的文章、论著不胜枚举。如此，我国城市研究十余年只能是在“量”上的增加来说明进步和发展。正如我以前有一篇文章所述，对“古都学”的提法提出疑问。^①这正是我国城市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的必然现象。另外，现阶段的城市研究，还缺乏综合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者全体的跨学科知识构成，因此而出现了某一学科的耗费很多的研究成果，而在另一个学科里是早已解决并且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同时，还出现许多在另一个学科看成是十分荒谬的简单解释。如有文章说：“城市是个现代词”，^②还有文章说：城市同人类一样古老云云，这些解释在相关学科领域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在汉语里城市词最早见于战国的文献中，《韩非子·爱臣》：“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③像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在当代城市研究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城市本身发展规律来分析，要正确认识城市的本质，应该首先从理论高度上，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全方位地研究，而不是把城市研究作为部门类研究的集合研

①《关于建立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学及体系探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6期。

②《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出版，第406页。

③又见《战国策·赵策一》载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史记》作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

究。也正是基本这一认识，笔者在1988年出版《春秋战国城市发展史论》后，又侧重研究城市经济比较和城市经济与文化关系问题，并把城市研究的重点，从先秦时代转向中国的近现代城市研究，特别是近现代中外城市比较和中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在比较城市研究上，我作了较早的尝试。《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上，杜瑜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杜瑜先生指出：张鸿雁在1983年《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比较——所见中国春秋战国城市的特点》一文“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的端倪。”实际上，这篇论文完成于1980年，是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通过十几年的城市研究，我深感比较城市研究的重要性，在比较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城市自身的格局、布局、沿革等外观比较，还要注意城市理论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体系的比较乃至比较研究的比较，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自己的城市理论研究有更大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在东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创建了城市与区域经济信息开发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其目的就是要从更高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城市研究引入高层次理论研究轨道，并结合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城市和区域经济问题，在创建城市经济关系学派和完整的城市经济学体系上向前迈进，并力倡“城市经济关系研究学派”和“比较城市经济关系”理论。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城市发展领域耕耘，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国城市发展史》、《城市经济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我深感城市研究的意义是那样深远，和我们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在即将叩开二十一世的大门，敲响

新世纪的钟声之际，我献上这自己的研究成果，献给帮助我成长的师长，献给一切曾帮助过我和关心我的人。

作者

于东南大学文昌桥寓所

1993年2月

上编 比较研究认识观

第一章 古代东西方城市 初期发展特点论

在历史研究中，对东西方社会奴隶制时代的差异是较为注意的。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使东西方古代社会各自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为什么东西方奴隶社会的城市会有自己的特征，追根溯源第一步，必须应该在“母体”中寻找。城市在不同社会的“母体”内产生，必然会继承社会“母体”的各种特征。这是研究城市产生问题的关键点，然而，这也是以往被严重忽视的关键点。强调东西方城市产生于同一时期，就是忘却了东西方的不同的历史前提，不注重这一历史前提，城市发生的问题研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城市产生硬性与一定时代放在一起，使城市产生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陷入一种“神秘”的无可解释的境地；另一种是以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产生状况为界标，去衡量套论其他各国城市产生的时间、形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不能解释的问题，如把西方文明之初有较发达私人工商业和较繁荣商品经济的城邦城市与中国城堡式、宫廷式的没有私人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城市”相提并论；同样，也把西方古典时代分散的、独立的、有立法自治权的城邦城市和中国有地域国家政体、专制集权的国家形式下的没有立法权、更不能脱离“天子”、“王权”控制的城市同日而语。

要使古代城市研究科学进一步发展，必须不宥成说，深入探索东西方城市产生的不同的历史前提、起点和发展道路。

一、不同历史前提奠定了不同城市内涵形成的基础

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不是在洪荒、“野蛮”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被湮废的文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文明是在一个孕育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之中，没有跳跃、没有间断地成长起来的：从洪荒蒙昧到野蛮时代，又从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大门，是从连续的原发形态——次生形态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发展长入文明社会的。

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一个经济发展原本较落后的民族，后来涌入一个发生过文明的地带，继承了这里一部分原有的文化，融合发展了这里的文化并利用了这里原来已经出现的经济生产形式包括方法、手段和工具。在中国，文明的发生一切都是自发的、渐进的，没有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切入，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有着差别巨大的前提，即不同的经济发展起点。学者注意的是西方古典奴隶制城市随着罗马奴隶制的消亡而衰落的事实，可是，古希腊罗马以前的城市衰落却很少有人提及。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西方历史的进程是颇具特殊性的，两次城市衰落、两次城市兴起——即古希腊罗马文明时城市的兴起和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并且还有三次外来民族的进入和民族融合过程：第一次是希腊文化民族的进入；第二次是罗马文化民族的迁徙；第三次是日耳曼民族的

迁徙与融合。①这种情况必然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古希腊文化的所在地，在古希腊文化前曾产生过一个较发达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一度中断了的爱琴文化，后来的希腊城邦是直接在爱琴文化的地域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文化形成前，国家形态、城市文化和城市经济一度毁灭，可是，世代繁衍相仿的人类，通过口碑传颂和心理、习惯的影响延续，深深影响着在爱琴文化所在地后来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

在希腊文化的克里特岛发现有宫殿、别墅、旅店、公共浴室和作坊等。克诺索斯宫殿（Knossos）和费斯特宫殿（Phaestus）占地都在一公顷半左右，在克诺索斯宫殿西北方向还有一个露天剧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向我们展示了爱琴文化时代也曾有较发达的城市。在爱琴文化中，发展较突出的迈锡尼文化是在希腊半岛上，稍晚于克里特文化。卫城里的宫殿、贵族住宅和卫城狮子门，表现了统治者的权威；这是一个专制王朝的文化。这里的城市中有公共浴室，又表现了这一地区从原始文化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文化特点。这一切告诉人们，分析古希腊罗马的城市和奴隶制决不能孤立地论证城市产生的作用，要充分注意有城墙的城堡和存在商品的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经济时，要注意到这一文明的起点和东方中国文明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这对于分析城市产生的原因和内涵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研究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

①《西洋全史·古希腊城邦》黎东方校订，冯作民编著，燕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

从古希腊城市的发源看，其发生过程和爱琴文化后期的城堡有联系。苏联的一部《古希腊史》认为：迈锡尼时代的城市已经失掉了当年的重要性。荷马时代的城市（*Polis*）也不过是坚壁固守的中心地点而已。但是，这些城堡初时作为军事领袖的居所，经过悠久的岁月已经变质了。于是，城堡这个概念扩大了。现在，不但坚壁固守一隅，甚至城堡近郊的一些居民地点也被称作城堡。城堡区域扩大了，围绕着城堡渐渐兴起了商业、手工业的村落。公元前八世纪至七世纪期间，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当推东方的米利都城和西方的科林斯城。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古城，如迈锡尼、俄科墨诺斯、梯伦，到了那个时代，已经完全荒凉，落入低等居民地的地位了。这段议论是强调迈锡尼时代的城市如何失掉“当然的重要性，爱琴文化相当多的古城是荒芜了，可是也有相当多的城堡在其周围兴起了商业、手工业村落，很显然，不从事农业、牧业的商业、手工业村落”是“早期城市”，这种早期城市和爱琴文化的城堡有着“渊源关系”，这种“渊源关系”在具体城市发生上，不一定是直接的，而在城市发生的整体过程，后来的人们了解这里城市的聚居状况和生产情况，给后代的遗产是生产水平和城市生活方式，如阿提卡，即中部希腊地区，是一个半岛，三面伸入爱琴海，萨伦纳克湾涤荡于其西，欧里波斯海峡，分隔阿提卡与优卑亚。阿提卡的中部地区，群山环拱，刻非索斯河分裂阿提卡盆地为二，使平原与海洋沟通，在后期迈锡尼时代，阿提卡已密布着小巴西琉斯们的城堡，废墟残迹，至今尚在。^①废墟的存在表明，城市在爱琴文化的灭亡中消失了，古希腊的城市不

^① 参见谢尔盖耶夫，《古希腊史》穆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一章。

是直接继承迈锡尼文化的城市，但古希腊城市经济在内涵的继承上是多方面的，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分析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业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美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①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以往的研究很少加以注意。古希腊之所以能在文明开启之初产生繁荣的城市，是在野蛮时代，载上爱琴文化的丰厚“遗产”，进入文明大门的，这个“主要遗产”是古典城市出现的经济、技术基础。希腊城市不是“原生型”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继往开来的类型。

多利亚人南下引起了希腊各民族的大迁徙。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九世纪，整个希腊地区，又回涌出氏族制度的波澜，淹没了前一时期少数地区的文明。

“荷马史诗”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情况。

荷马时代，农业、畜牧业都已相当发达。② 牛耕、深翻和家畜饲养，更重要的是这时在墓葬中常有铁器出土。在希腊广阔的沃土上，尽管“文明”有暂时的倒退，但生产力仍有较大的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经济前提。

中国城市发展的“前提”没有对外来“文化”遗产的“继承”，整个过程是自身积累和完善的过程。从世界文明发祥和文化发生来说，在黄河流域原始社会末期最初出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页。

② 文献记载当时人们以畜牧数量的多少来标明富有程度。